

论《伤逝》主题的“对话性”

赵磊

(南京师范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 通过对《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婚姻悲剧的具体分析,指出文本存在着启蒙意识、封建意识、生存意识与忏悔意识等多种意识形态,并且各种观念之间相互驳诘与渗透,文本的多重主题因此体现出“对话性”的特点。《伤逝》显示了作者矛盾性思维的复杂性与未完成性,并且具有某种哲学品格。

关键词 爱情婚姻;多重主题;“对话性”;哲学品格

中图分类号 J2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4-0062-03

巴赫金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的特点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是一种全面对话性的小说。^[1]这种“对话性”主要体现为主人公之间或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内部存在着多种声音,文本的多重主题由于缺乏唯一的价值评判标准而同时并存又相互对立,小说因此具有开放性与未完成性的特征。当我们分析鲁迅的爱情婚姻题材小说《伤逝》时,发现《伤逝》因其独特的精神结构以及主人公的主体意识的复杂性,而使小说具有多层次的精神内涵。《伤逝》的主题也因此表现出鲜明的“对话性”特征。

20世纪20年代是新旧文化交错的年代,虽然传统思想依然占据着主体地位,但西方的现代价值观念在青年中有广泛影响。《伤逝》讲述的就是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男女涓生与子君因爱情而结合,最终却因生活、世俗的压力而分裂的爱情婚姻悲剧,小说以子君的死亡与涓生的忏悔而结束。

小说开始就写出涓生的悔恨之情:“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那么谁应该对两人的悲剧负责?主人公的精神历程即围绕此展开。“重要的不是涓生所要叙述的故事(也即他与子君的恋爱与离异故事)本文”,而是涓生的自省,即涓生在叙述“本文”过程中所显示的情感、心理以及他的思考。^[2]这是文本关注的中心问题。

涓生是一位现代启蒙知识分子,从其身份的本质性上看,他是一个“思想者”,是一个不断改变对世界与自身看法的思维着的个体。首先,他有着明确而强烈的启蒙意识,这体现在他与子君的恋爱过程中。当两人相会的时候,涓生便“谈男女平等,谈伊

孪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这既是一种话语交流方式,又是对自我启蒙身份的确认与启蒙思想的实践。“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话应该被看成是受了新思想影响的子君在涓生的热情激发下发出的爱情宣言而非个性宣言;所以,这句话最关键的意思是,要求与涓生相爱的权利,借此表明她对彼此交往的态度和对涓生的爱意。^[3]情感的成分大于思想的成分。涓生的反应却并非如此,“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边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涓生把子君的爱情宣言看做是其启蒙实践的成功的证明,是对其启蒙形象的崇高化认同,因为自我主体价值得以确认而感到异常的激动;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彻,坚强得多。”这句话表明涓生的主要关注点是思想而非情感,并按起其理想化诉求把子君塑造成一个坚决反抗传统的时代新女性,实质上他对子君的爱情是建立在这一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的,而两人浑然不觉,这种理想化的价值主体塑造在现实生活中必然显示出脆弱性与虚幻性,悲剧已暗含其中。

当涓生“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向子君示爱的时候,子君“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从中可以看出,子君还是深受传统的婚姻观念影响的,以至于在面对涓生这种现代的爱情表白方式时“脸色变成青白”;眼里射出悲喜”,“夹着惊疑的光”,但获得爱情时的本能激动掩盖了

这一切。然而,随后平静而琐碎的家庭生活使得子君的传统婚姻家庭观念表现出来,她养小油鸡,买巴儿狗,管家务,终日汗流满面,她尽的是一位传统家庭主妇的职责,这种对传统家庭生活方式的内在认同与实践消解了她所受的启蒙思想的影响。而这在涓生看来却是无法接受的,子君不爱养花,缺乏情趣,对子君操劳家务并不理解,反而抱怨没有工夫去“读书和散步”;^[64]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的操劳”。结合下文他对待饭菜的不满态度,这句话显示了涓生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想性特征,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清醒认识,极具讽刺意味。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涓生的浪漫化诉求还是其封建性的男权中心意识的显露:他要求子君以他为中心存在,按照他内心的意愿存在。涓生潜在的男权意识与他作为启蒙知识分子所信仰的个性平等、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念构成了内在的冲突,启蒙主体本身发生了分裂。这样,启蒙意识在反叛封建意识的同时,自身也遭到封建意识的消解,两者相互对立,又互相联系,从而反映了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同时“展示了以‘娜拉出走’为代表的现代性价值理念在当时历史境遇中的两难处境,批判了它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功能和虚拟的乌托邦色彩”^[64]。

两人内心追求的差异使其同居生活产生了内在的分裂,而外来的生活打击最终使这种分裂变成了现实。涓生失业了,这是传统保守势力压迫的结果。这给两人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我的心却跳跃着。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我的心因此更缭乱,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影像——会馆里的破屋的寂静,在眼前一闪,刚刚想定睛凝视,却又看见了昏暗的灯光。”涓生感到了内心的脆弱与无力,而作为启蒙对象的曾经勇敢的子君也不再能给他对抗现实的勇气与力量,这便显示出了启蒙意识在现实伸延中的脆弱性:“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影像”,涓生的潜意识流动显示了其内心的无力感与逃避的念头。理想化了的子君形象在残酷的打击面前破碎了,这本为涓生直面现实提供了条件,然而,这种对子君的重新认识反而使涓生获得一种思想上的优越感,反过来把自己置于强者的地位:“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这种对自我主体力量的重新确认使他对子君产生一种排斥感。

涓生在通俗图书馆里“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涓生经过思考发现的生存意识长期

被视为《伤逝》的主旨,认为爱情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之上。然而,爱情不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吗?不是为了爱而放弃了生活,而是因为爱而失去了经济来源,这才是涓生思考的前提。那么,涓生的结论意味着对他和子君的纯真爱情的否定,而这种爱情是在其启蒙思想实践下实现的,他对爱情的否定意味着他对启蒙意识的质疑。这是否可以说,涓生已彻底放弃其启蒙立场了呢?事实并非如此!

当涓生在脑海中展开对激越而沸腾的生活前景的想象时:“子君——不在近旁。”他潜意识里已决定放弃子君了。对涓生的冷漠,子君的反应是敏感的。她预感到了前景的可怕,于是,她“笑着和我谈到还在会馆时候的情形”;^[65]她从此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逼我做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子君试图以这种方式证明爱情在两人之间的真实存在,以挽回即将破裂的家庭,因为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一切。而涓生却对子君的行为感到荒谬:“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涓生排斥了世俗中的子君,并把他从生活的实际体验中发现的生存要义置于启蒙话语体系之下,把生存意识的获得归结为读书思考的结果,而子君并非如此。本来,涓生为求生存而质疑了启蒙精神,现在却又以启蒙话语对其生存意识进行重新阐释。“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涓生决定与子君分离,却以谈论往事开始,与其说是为了重温以往的激情,不如说是涓生想要子君像以前离开旧家庭一样离开这个新家庭的暗示。这种启蒙话语以前是两人结合的思想指引,而现在却成了两人分离的理论依据;启蒙精神摧毁了旧的不平等的、不正确的、直接的统治权,但同时又在普遍的联系中,在一些存在的东西与另外一些存在的关系中,使这种统治权永恒化。^[65]这样,生存意识在与启蒙意识对立的同时,又呈现出某中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来自于其启蒙身份决定下的话语体系的统一性。

子君回忆往事是为了挽回爱情,涓生却是为了分离,爱情既然破灭,同居已无意义,子君只有选择离开。然而,这对为了爱情而背叛旧家庭的子君来说,无疑是一条不归之路。子君的离去并没有如涓生所设想的那样,给他一种解脱感,反而使他产生一种负罪感。当涓生为独自生存而决定舍弃子君时,也预感到子君不幸的结局,但挣扎的渴望遮蔽了内心的阴影。然而,当分手后的真实呈现在他的面前时,残酷的现实体验比浪漫的美好生活前景更加折磨他的心灵;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

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活的人”，他以说真实这一具有本体性的思考为自己的选择提供依据，但说真实的后果却是子君“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与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而失去爱情的子君再也不会那么勇敢与无畏了；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在我所给予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这一切可怕的后果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由此；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摒弃于强有力的人们。”他感到了自己内心的自私、软弱与冷酷，他真诚地忏悔了。

“子君死了《伤逝》所伤，是人间至爱的亡逝，精神的亡逝。^[6]只留下涓生独自咀嚼无尽的悲哀；即使在寒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然而，忏悔的可行性前提是“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这当然是一种荒诞性的假设，忏悔对现实而言；这却更虚空于新的生路”，没有实际意义。况且，忏悔只是针对子君死亡这一事实本身，而没有进行自我意识的深刻反省，虽然也意识到自己的“卑怯”，但对导致自身“卑怯”的根本原因缺乏自省；对其启蒙身份在中国的悲剧性命运缺乏清醒的认识，这样，忏悔便显得浮光掠影，缺乏深层意义。忏悔意识的不彻底性，使涓生不能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力量，而只能得到灵魂上的安慰。这种忏悔并不是像有些研究者所贬低的那样，是虚伪的，是一种自我解脱的方法；也不是如有些研究者所拔高的那样，意味着灵魂的苏醒与精神的升华。应该说，涓生的忏悔是真诚的，但这种忏悔的价值和意义却又是并不大的，它无法对自身与人生做出彻底的反思，从而显示了人性的脆弱与无力，而这本质上来自于人类无法把握世界的宿命感，文本从而具有本体论上的反思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伤逝》与其说是一部爱情的忏悔录，不如说是一部人性的启示录。

“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说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开辟生路，而现在对其进行否定，则意味着对充满残酷性的生存意识的否定，那么，因无爱而“说真实”和因忏悔而“说谎”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汪晖先生认为：“‘说谎’与‘欺骗’将使涓生在道德原则上与自己信奉的理想和爱情的对象产生深刻的裂痕，而承认‘真实’不仅直接导致子君的死亡，并同样使自己在道德上成为逃避重担的‘卑怯者’。^[7]涓生处于这种选择的两难困境中；说真实”与“说谎”都不免产生一种绝望感。应该说这种分析多少具有一些抽象意味。因为具体文本中涓生已然作出了决定，并不存在两难选择的问题。“说真实”是在子君离去之前，这是在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上的选择，因忏悔而

想“说谎”是在子君离去之后，出于道德层面上的自责而希望做出的选择，但是这种道德上的自责在现实中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无法使子君在现实中归来以改变她的命运。忏悔只是在精神上对其生存意识做出了反省，生存却不会因忏悔而停止，备受折磨的灵魂反而因忏悔获得了拯救。事实上，涓生的确把忏悔作为开辟新路的前提：“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说明，忏悔的目的在于自身的生存。忏悔意识与生存意识又纠缠在一起，共同存在于主人公的精神历程中。

文本揭示了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复杂特征。涓生既有新思潮影响下的现代价值观念，但他又是在传统社会中生存的，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封建意识（具体体现为男权中心主义），他还有知识分子典型的理想性与精神至上性，现实在其头脑中不具有本原意义，不是被消解，就是被删改、过滤，理想成为对抗现实，保持心理安慰与自尊的主要手段。涓生启蒙身份的复杂性，使他在进行启蒙实践的过程中渗透着封建意识；在生存意识试图消解启蒙精神的时候，又以启蒙话语重构现实；而其忏悔意识又具有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安慰的特点，这种忏悔的目的还是为了生存。各种思想意识既互相对立，又无法完全消解对方，既有鲜明的思想批判意味，又没有确立唯一的价值评判标准，从而使《伤逝》具有某种“对话性”，反映了作者不断反省的思想境界。应该说，“对话性”是小说主题指向的主要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伤逝》主题指向的“对话性”显示了文本的开放性特征，不断地反思各种思想意识的局限性，从而不断地体验绝望，而不断地探索人生与人性的真义，则又意味着对绝望的不断反抗，这是与鲁迅先生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相一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伤逝》具有一种哲学品格。

参考文献：

- [1]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362.
- [2] 钱理群,王得后.鲁迅小说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1.
- [3] 罗小茗.涓生的思路——《伤逝》重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X(3).
- [4] 贾振勇.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J].鲁迅研究月刊,2001(3).
- [5] 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简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0.
- [6] 林贤治.守夜者札记[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29.
- [7]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11.